

西部民族地区 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徐广国 著



科学出版社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徐广国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的著作。全书分七章,分别是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探索——理论与实践;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现状——矛盾与困境;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过程——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升级;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实践——企业及其竞争力的提升;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探索——地方政府的职能与作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宁夏实践;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未来——趋势展望和政策建议。

本书可供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公务员、从事区域经济研究的机构、高校经济学专业师生以及从事区域经济研究人员参考使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徐广国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8.6

ISBN 978-7-03-052435-5

I. ①西… II. ①徐… III. ①民族地区经济-转型经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宁夏 IV. ①F127.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8495 号

责任编辑:胡云志 滕亚帆 乔艳茹 / 责任校对:贾伟娟

责任印制:吴兆东 / 封面设计:华路天然设计工作室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制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18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 B5 (720 × 1000)

2018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1 3/4

字数: 236 000

定价: 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一

新常态下政府应该如何抓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

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的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国际上出现了对我国增长前景的悲观论调，国内也有不少怀悲观情绪者。特别值得担忧的是，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在推动经济转型升级方面，市场在发力，但一些地区的政府的作为相对滞后。以往地方政府抓基础设施、抓招商引资一抓就灵的局面，不复存在。面对经济新常态，曾经在以往高速增长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重要角色的各级政府，尤其是各级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处于不知所措甚至懈怠的状态。我国现在仍然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仍然是我们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且，国际竞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为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推动经济迈向中高端，各级地方政府不知所措的局面必须改变，懈怠的状态必须扭转。那么，经济新常态下，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抓手和着力点在哪里？这是一个亟待回答的重大实践问题。为此，首先需要理解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机制。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本质是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其前提则是越来越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技术创新，提高现有产业中产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二是通过产业升级，将现有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这两者的实现需要有“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共同作用。

“有效的市场”的重要性在于，按照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的同类产品中，成本才会最低，才会最有竞争力，才可以创造最大的剩余和资本积累，使得比较优势从劳动或自然资源密集逐渐向资本密集提升，为现有产业、技术升级到资本更为密集、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新技术提供物质基础。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的前提，则是必须有一个能够很好地反映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如果有这样的价格体系，企业为了自己的利润和竞争力，就会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合适的技术和产业，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会存在。所以，按比较优势发展产业、选择技术的前提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市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目的就是为

了建立完善的市场体系，使各种要素的价格能够反映其相对稀缺性，为我国经济更好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以形成竞争优势，提供必要的制度基础。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为的政府”也必不可缺。首先，这是因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资源必须随着要素积累、比较优势变化，不断从现有技术和产业配置到新的效率更高的技术和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的结构变迁过程。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必须要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倘若失败，将承担所有成本，并让后来者知道螃蟹不可吃，不去犯同样的错误；倘若成功了，后来者将会随之涌进，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不会有垄断利润。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必要的安排，对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言，失败的成本和成功的收益是不对称的；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不管失败还是成功都会为后来者提供有用的信息。因此，政府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的激励，才会有人愿意去冒这个风险。发达国家的专利制度发挥的就是这种功能。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一般是在国际的技术和产业链内部来进行的，多数情况下不能给予专利，但是，仍然需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激励。当然，这种激励需要找到合适的替代方式。

其次，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成功与否，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勇气、智慧和企业家才能。例如，要进入一个新的产业，所要求的从业人员的技能，和以往产业不尽相同，如果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完全靠自己培训员工，后来的企业可以以稍高的工资聘走拥有新技术的员工，而使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蒙受损失。新兴产业所需的资本规模和风险也通常会比原有的产业大，需要有新的能够动员更多资本、有效分散风险的金融制度安排和其匹配，这也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随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资本密集度和规模经济水平的提高，市场的范围和交易的价值会不断扩大，交通、电力、港口等硬的基础设施和法律、法规等软的制度环境，也必须随之不断完善，这些完善显然超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的能力之所及。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技术和产业会越来越接近国际前沿，新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与这些新技术和新产业相关的基础科学的突破，基础科学的研发属于公共产品范畴，其发现不能申请专利，企业家不会有积极性持续地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凡此种种困难，均需要一个“有为的政府”来协调不同的企业，加以克服，或是由政府自己直接提供相应的服务。只有这样，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才能顺利进行。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可动员和配置的资源有限，不可能满足各种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外部性补偿，以及完善所有相应条件的要求。因此，和企业一样，政府也必须对可能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经济和社会回报做出甄别，按“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精神，以产业政策集中有限资源，协助企业家推动那些回报最高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有这样才能促进经济最好最快地

发展,避免陷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如何在“有效的市场”环境中发挥“有为的政府”的作用,推动产业从中低端向中高端,以及将来从中高端向高端升级,实现可持续的中高速增长?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根据现有产业和国际前沿的差距,可将我国的产业分成五种不同类型,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各有差异。

第一种是追赶型产业。2014年我国人均GDP为7500美元,同年美国的人均GDP是57101美元、德国44999美元、日本38491美元、韩国24329美元。这种人均GDP的差距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差距,代表我国现有产业的技术和附加值水平,比发达国家同类产业的水平低,处于追赶阶段。我国的汽车、高端装备业、高端材料即属于这种类型。

对于追赶型产业,我国各地政府和金融机构可以在资金融通和外汇获取上支持所在地的合适企业像吉利汽车、三一重工、汉能那样,到海外并购同类产业中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以此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发达国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增长乏力,很多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经营不好,低价求售,这就出现了许多好的并购机会。

在没有合适的并购机会时,各地政府也可以提供方便,支持所在地的企业像华为、中兴那样,到海外设立研发中心,直接利用国外的高端人才来推动技术创新。

另外,各地政府也可以筛选我国每年从发达国家大量进口的高端制造业产品,根据其地区比较优势,创造这些产业所需的基础设施,改善营商环境,到海外招商引资,把那些高端制造业产品的生产企业吸引到国内来设厂生产。我国现在的GDP规模约占世界的13%,在新常态下,每年7%左右的增长意味着我国每年对世界贡献将近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现在世界每年的经济增长在3~4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我国每年对世界市场容量扩张的贡献率达到25%~30%。如果地方政府能够根据这些高端制造业的需要提供合适的基础设施、人才培养、营商和法制环境,国外许多高端生产企业会有很高的积极性到国内设厂生产,以满足我国不断扩大的需求,并以我国为基地生产产品来供应世界各地的市场。江苏省太仓市的中德企业合作园区2012年被工业和信息化部授予“中德中小企业合作示范区”,到2014年底吸引了220家德国企业入园,投资总额达20亿美元,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在中高端产业的招商引资上我国仍处于大有作为的机遇期。

第二种是领先型产业。我国作为中等偏上发展水平国家,有些产业,像白色家电、高铁、造船等,其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水平或已接近国际最高水平。领先型产业必须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新技术,才能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

自主研发包括两种不同性质的活动: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和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所需基础科研的突破。企业开发的新产品、新技术可以申请专利,这类活

动理当由企业自己来进行。但是,基础科研不仅投入大、风险高,其产品是论文,属于社会公共知识,企业没有从事基础科研的积极性。

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的产业,绝大多数属于领先型产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所需的基础研究,绝大多数是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高校,或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等政府支持的科研机构来进行,欧盟、日本等发达地区或国家也以政府的资金支持类似的机构来进行这方面的基础研究。我国自然也必须采取同样的方式来支持领先型产业的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所需的基础科研。

我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用财政拨款设立科研基金,支持所在地领先型产业的企业与科研院所和高校合作进行基础科研,支持企业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可以以资金支持相关行业的企业组成共用技术研发平台,攻关突破共用技术瓶颈,在此突破的基础上再各自开发新产品、新技术。在企业新技术和新产品开发取得突破后,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采购帮助企业较快地形成规模化生产,以降低单位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领先型产业需要到世界各地建立加工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的网络,以开发市场,中央和各地方政府也需要在人才培养、资金、法律、领事保护上给相关企业的海外拓展以必要的支持。

第三种是退出型产业。这类产业有两种类型,一类是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另一类是在我国还有比较优势,但是产能有富余的产业。

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是最典型的第一类产业。这类产业最主要的成本是工资成本。目前,我国一线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是 3000~4000 元人民币,相当于 500~600 美元。到 2020 年“十三五”结束,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翻一番”目标,加上人民币升值,普通工人的月工资至少会上升到 1000 美元。这类产业在我国失掉比较优势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面对这种挑战,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中的一部分企业可以升级到品牌、研发、品管、市场渠道管理等高附加值的微笑曲线的两端。从事生产加工的多数企业则只能像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的日本和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亚洲四小龙的同类产业中的企业那样,利用其技术、管理、市场渠道的优势,转移到海外工资水平较低的地方去创造第二春,把我国的 GDP 变为 GNP,否则,必然会因竞争力丧失、海外订单流失而被淘汰掉。这些加工企业在海外的成功也将给我国相关产业中附加值比较高的中间部件和机器设备的生产企业提供海外市场,成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拉动力量。

我国各种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绝大多数在一些市县形成了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可以采取以下两种因势利导的政策:一是提供设计、营销方面的人才培训、展销平台等,鼓励一部分有能力的企业转向“微笑曲线”的两端,经营品牌的企业则可以对其新产品开发的费用给予和高新产业研发

费用一样在税前扣除的待遇；二是协助所在地加工企业抱团出海，提供信息、海外经营人才培训、资金支持，以及和承接地政府合作设立加工出口园区等，帮助企业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资源优势来提高竞争力，创造企业的第二春。

根据这一思路，我国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业应向何处转移？由于我国是一个 13 亿人口的大国，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显示，我国整个制造业的从业人员高达 1.25 亿人。就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越南、柬埔寨、老挝、孟加拉国等国而言，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稍微往那些国家转移，马上就会带动其工资和我国一样迅速上涨，实际上这正是近些年来那些国家出现的情形。

从人口和劳动力供给而言，非洲现在约有 10 亿人口，其中大量是富余的农村年轻劳动力，和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状况一样，其目前的工资水平仅为我国的 $1/4 \sim 1/10$ ，因此非洲是承接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最合适的地方。但一个地方要成为现代制造业加工出口基地，除了工资水平低以外，当地的生产企业还必须具备比较现代化的管理和技术能力，以及国际买家对当地企业产品质量和按时交货的信心。非洲国家现在遇到的发展瓶颈是，基础设施薄弱，国际买家对非洲企业的管理、技术、产品质量和按时交货的能力缺乏信心。如果我国中央政府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产业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在“一带一路”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合作框架下，能够帮助非洲国家学习和吸取中国在招商引资方面的经验，设立工业园区改善基础设施，提供一站式服务，以发展产业集群的方式将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吸引过去，非洲也能快速发展起来。

2012 年我国广东东莞的华坚鞋业在埃塞俄比亚投资设厂迅速获得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华坚在国内的工资占总成本的 22%，埃塞俄比亚工人的工资水平只有国内的 10%，工人生产效率是国内的 70%，工资总额实际上只有国内总成本的 3%，下降了 19 个百分点。华坚所有的原材料来自国内，产品全部出口，物流成本从在国内占总成本的 2% 增加到 8%，扣除物流成本高出的 6 个百分点，华坚在埃塞俄比亚的厂和国内相比还节省 13 个百分点。埃塞俄比亚和许多其他非洲国家目前处于工业化的早期，大量剩余年轻劳动力滞留在劳动生产率水平极低的农业和服务业，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在未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里工资水平基本能够维持不变，去的企业多了，生产规模扩大，物流成本将下降，所以，我国企业到那里投资生产的利润水平还会随着生产规模扩大而上升。

随着我国国内工资水平的上涨，许多 20 世纪 80~90 年代转移到我国大陆的台资、港资等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企业已经转移出去，我国自己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企业则因为不熟悉国外投资环境，缺乏海外经营管理人才而仍滞留国内。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集群所在地的政府，可以为企业提供适合发展加工出口产业的国家的信息，和承接地政府做好对接，帮助他们学习中国的招商引资经验，设立工业园区，营造良好的投资和经营环境，会同行业协会因势利导，协助我国

的企业抱团到那里投资。我国的商务、外交等中央部门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等金融机构也要在投资保护、签证便利和金融上给走出去的企业以必要的支持。

退出型的第二产业则包含钢筋、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建材行业。这些产业近些年在我国发展很快，机器设备很新，技术相当先进，生产能力是按满足过去高速增长所需的投资的需要形成的。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增长速度从过去 36 年年均 9.7% 的高速回落到现在 7.0% 左右的中高速，这些产业在国内也就出现了不少过剩产能。但是，这些产业的产品在非洲、南亚、中亚、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还严重短缺，我国政府可以像支持劳动密集型加工出口产业向非洲转移那样，以同样的方式支持这些富余产能产业中的企业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将产能转移到“一带一路”沿线、与我国友好、基建投资需求大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投资既能使这些企业摆脱困境，也能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发展，是一个双赢的选择。

第四种是“弯道超车型”产业。此类产业是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的新兴产业。相对于一种新药的研发周期可能历时 10 年以上，成本投入高达 1 亿美元，信息与通信产业的软件、手机等的研发周期仅为几个月或一年，这类产业就属于人力资本需求高、研发周期短的“弯道超车型”新兴产业。在这类产业的发展上，我国拥有国内市场巨大、科技人才多、完备的生产加工能力等优势，并已经出现了华为、中兴、阿里巴巴、腾讯等成功的企业。各地政府可以针对这类企业的发展需要，提供孵化基地、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风险投资、制定优惠的人才和税收政策，支持国内和国外的创新型人才创业，利用我国的优势，推动“弯道超车型”产业在当地的发展。

第五种是战略型产业。这类产业通常资本非常密集，研发周期长，投入巨大，我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但是，其发展关系到我国的国防安全，大飞机、航天、超级计算机产业即属于这种类型。战略型产业有一个特性，即它不能完全依靠市场，需要有政府的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起来。过去，政府的保护补贴主要是通过对各种要素价格的扭曲和直接配置来实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要素价格的人为扭曲将会被消除，今后应由财政直接拨款来补贴这类企业。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无论国防安全型战略产业是民营还是国有，也都由政府财政直接拨款来支持。

对战略型产业的扶持是国家行为，应该由中央财政而不是由地方财政来承担。但是，这类产业落户在哪个地方，会间接地促进那个地方配套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所以，各级地方政府可以支持鼓励配套产业的发展，并改善基础设施、子女教育、生活环境等软硬条件，来争取战略型产业落户当地，以实现战略型产业和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双赢。

在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仍然处于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根据各种产业的特征,发挥好“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即使在相对不利的国际外部环境下,我国的经济也仍然能够保持 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到 2020 年前后跨过人均 GDP12 615 美元的门槛,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立下重要的里程碑。

徐广国同志在北大读研究生的时候是我的学生。多年来,他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特别是对一些影响当地发展的突出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和研究,在一些方面积极创新,这些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形成的《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一书,探讨西部民族地区转型发展问题。这样的探讨研究,对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对于加快西部大开发、民族地区发展具有现实意义。本书的很多观点是作者结合自身工作实践提出来的,特别是关于西部民族地区政府在转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论述,我也有同感,并把我写的《新常态下政府应该如何抓经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作为本书的序言。

林毅夫
2017 年 11 月

序 二

徐广国博士的专著《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是一种常态现象，世界上典型大国几乎都存在着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尤其对于多民族与幅员辽阔的典型国家就更为明显。我国幅员辽阔，拥有 56 个民族，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了相对特殊的扶持政策，一度使得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得以缩小。然而，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所以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了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得我国的生产力得到极大的解放与发展，国民经济水平与综合国力得到极大提高，目前我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许多产品的产量已经位居世界首位，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在这一改革进程的前期，我国采取了先试点后推广的方式，改革进程为设立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十六个城市—沿海开放—延边开放—全面开放，这一进程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各个地区之间开放时序上的差异，由此造成发展政策的区域间不平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内陆及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致使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这种由点到线再到面的渐进式改革模式，既是国情所需，也是为了尽量降低改革风险。在完成了全面对外开放这一改革进程以来，党和国家将经济工作的重点从过去推动区域间经济非均衡发展转向推进区域间经济均衡发展，加大了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财政扶持力度，并出台了一系列鼓励这些地区发展的特殊性鼓励政策，对于这些地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目前，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速总体呈现出超越东部地区的态势，这将有利于实现地区间均衡发展。然而，我们也不应忽视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内陆民族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与产业层次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且发展的内驱动力不足、生态承载能力较弱，如何实现民族地区既好又快、可持续地发展就成为一个既现实又迫切的时代课题。

徐广国博士在总结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经济增长本源因素的角度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剖解分析，总结了世界上典型

国家在促进区域间均衡发展进程中的共性做法：高度重视中央政府的作用；通过建立健全专门性区域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将扶持与促进欠发达区域的发展纳入法律轨道，以保障扶持政策的规范性与持续性；高度重视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提供环境支撑；利用财政、税收、金融政策支持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设立专门性机构，专司落后地区的开发。同时分析了我国最具影响力的三种地区发展模式——东莞模式、昆山模式、温州模式产生的动因与初始条件，认为这些发展模式的产生与发展是由其自身所处的特殊环境决定的。徐广国博士总结与提炼出东莞、昆山与温州模式所具有的共性特征：第一，较好地反映了当地人文与资源禀赋特质；第二，高度重视发展的制度环境建设与保护；第三，重视区域内资本积累和激活及其相应的人才集聚与开发；第四，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第五，发展模式不是恒久不变的，而是不断演化与发展的，且在演化与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融合和趋同现象。由此揭示了区域发展模式一般性与特殊性的两重特性，说明了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可以学习与借鉴，但不可以照搬照套，应当结合自身的特殊发展环境进行创造性吸收与改进。

宁夏回族自治区地处我国西北内陆，是国内最大的回族自治区，集内陆、民族聚居、西部三个特点于一身。徐广国博士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作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的研究对象无疑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往往表现为互为矛盾的两面性：拥有相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劳动力质量相对较低；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资源的利用往往多限于粗加工形态；资本相对匮乏，但大量的本地资本往往流入经济发达地区；人力资本相对贫乏；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必然导致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层次较低、产品的技术含量较低。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的不足往往极易导致区域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能力不足，从而可能导致这些地区陷入低水平发展的陷阱。因而，对于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转型与发展路径的选择要立足自身的客观条件，找准自身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着力改造与提升现有的主导产业，花大力气培育与强壮新兴主导产业。民族地区在确定主导产业时，应坚持以我为主的原则：既兼顾产业选择的一般性原则，又兼顾本区域的特殊性原则。也只有这样，才可能提升区域总体竞争力，实现民族区域的跨越式发展。

任何一个地区的经济转型与发展之关键在于企业，企业对于区域生产要素整合和利用的水平与效率直接决定了该区域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从而影响区域的产业结构形态与水平。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一方面企业是独立的生产经营活动主体，另一方面企业是资源配置的组织者与引导者。企业与政府在对市场的资源配置与组织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关系，企业规模越大，它在引导资源的有效配置方面对政府的替代作用就越大，越可能担负起资源配置与引导的功能。

但由于西部民族地区企业总体规模偏小,对资源的配置与组织能力较弱,这就需要积极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即由地方政府承担以下几个方面的责任:为企业发展营造宽松环境;为中小企业提供及时准确的决策信息与战略咨询服务;支持与推进信息技术及其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改善地区的金融环境以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在促进区域发展的进程中,地方政府处于突出与无可替代的地位。对于民族地区来说,由于其市场经济发育与组织程度较低,企业对于资源的组织与配置能力较弱,更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但作用的力度与范围都应当有明确的界限: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强力推进市场体系与制度建设。为保障政府职能得以切实履行,徐广国博士在该书中提出民族地区政府管理模式必须实现六个“转变”:由传统意义上的“管理型政府”向现代的“服务型政府”转变;由高度“封闭式行政”向“公开透明化行政”转变;由高度集权式的单一中心治理结构向分权式的多中心治理结构转变;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型政府”转变;区域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与实施由“自上而下”方式向“自下而上”方式转变。这对于指导与规范政府的行为无疑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同时,徐广国博士在该书中还提出,要调整好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组织的关系,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边界,使政府职能和行为越位的还位、错位的正位、缺位的到位。这些论述无疑对于民族地区在推进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进程中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徐广国博士不仅注重对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方面的理论探讨,而且将其理论成果积极地运用于指导区域经济转型与发展,并且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效果。其在指导区域经济发展实践中的主要做法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在自觉发挥市场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更充分地发挥政府作用;二是把扶贫与扶智有机结合起来,以促进民智发育与发展的办法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三是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简化企业设立手续,促进全民创业;四是制定优惠政策,推进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五是把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着力点;六是高度重视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扶持与鼓励运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特色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尤其值得提出的是,银川市积极进行行政审批权相对集中改革,打造经济发展的政策“洼地”,率先在全国成立行政审批服务局,将26个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整体划转行政审批局,“一枚印章管审批”,效率提升近90%,网上审批事项达到81%，“不见面”审批事项达到70%，真正实现了推开一扇门，办成一揽子事。

徐广国博士刻苦钻研、对学术研究精益求精的执着追求,以及学以致用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希望他能够一如既往,进一步探求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之路,为推进民族地区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徐广国博士凭借其扎实的经济学

理论基础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民族地区的经济转型与发展贡献了极具价值的理论成果与实践总结，因此，特为该书作序，向关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经济学专家、学者，以及政府的政策研究机构与企业界推荐。

刘迎秋

2017年11月

前 言

经济转型与发展不仅是一个经久不衰的政治与经济话题，同时也是一个带有很强实践性的世界性话题。我国既是经济大国，又是多民族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部地区，尤其是东部与西部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断拉大，近几年西部地区虽然在经济增速上超越东部，有加快发展之势，但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巨大的落差，研究西部民族地区加快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学术界自发形成的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研究的一大热点。进入 21 世纪以来，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区际差距更加凸显，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和制约了区域协调发展，这不但引起了中央高层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更引发了学术界的研究热潮。但是，主流经济学派更多地是从经济学的普适性角度进行研究，从东、中、西部经济格局进行比较分析，着眼于单纯的经济 development 问题，也涉及了很多经济发展模式，但从民族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视觉点——民族经济学进行研究的不多，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也较弱。

我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有力地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保障。面对经济进入新常态，各地相继实施产业转型升级战略，西部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面临的问题是多方面的，如何借力用力实现转型发展并“弯道超车”，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笔者由于长期在民族地区工作，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了解和实践经验，因此，笔者以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管理工作的经验为基础，用与学紧密结合、学以致用，互相推进，选择以民族地区经济转型发展为落脚点，依托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民族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机制设计等理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内在要求的角度和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高度，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为典型案例，对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和发展进行研究，试图寻求适合其发展的模式，以期能够推动西部民族地区快速发展，与全国同步实现全面小康社会。

全书共由七章内容组成，系统梳理了国内外典型地区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和实践分析的相关文献资料，介绍了美国、欧盟、日本、巴西、印度等国家或地区区域开发政策实践，并对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两种模式做了比较，力

图找出现有理论与实践典型发展模式的主要差异及存在的共性，进而分析并阐明制约西部民族地区，特别是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探讨和发掘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具有比较优势和竞争能力的各种要素，提出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主导产业做大做强、企业竞争力提升、地方政府职能及其作用的对策和建议。

本书的特色与创新在于，第一，在对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在现阶段，地方政府在经济转型与发展过程中要起到更为重要的作用；第二，提出政府的作用不仅存在力度的大小问题，还存在方向问题；第三，提出了在西部民族地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不是简单的补充或替代关系，而是相互协同的关系。政府参与和干预经济发展的力度会随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减弱，但在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阶段，“强政府、强市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第四，以相对封闭的民族地区视角来研究区域经济转型与发展，将民族性、落后性与区域性同时纳入理论研究过程，有助于形成具有时代特点和实践价值的理论结论和政策；第五，提出了西部民族地区主导产业的选择原则，即要在综合考虑主导产业的一般性的同时，充分考虑西部民族地区的民族性特点和从西部大开发转向西部大开放、从开发式扶贫向开放式扶贫转化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应的政策选择原则。

本书是在笔者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撰写的，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刘迎秋教授、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秘书长李欣欣教授、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所长韩保江教授、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王红领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增长研究室主任刘霞辉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企业研究室副主任剧锦文教授的大力支持。他们的指导意见和建议，拓展了笔者的研究视野，深化了笔者的研究目标，给予笔者研究与写作以巨大帮助。本书能够顺利出版，与他们的合作和努力是分不开的，特别是我在北大读硕士研究生时的老师林毅夫为本书作序，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以共同促进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徐广国
2016年8月

目 录

第一章 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探索——理论与实践	1
第一节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1
第二节 典型国家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	6
第三节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三种模式及其比较	9
第四节 东部地区经济起飞“三种模式”对西部民族地区的适用性分析 ..	13
第二章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现状——矛盾与困境	15
第一节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历史与现状	15
第二节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 ——生产要素规模与质量	19
第三节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 ——产业结构及其特点	25
第四节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面临的制度约束 ——产权结构及其构成	33
第五节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面临的外部约束 ——对外开放及利用外资	36
第六节 影响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的因素的实证分析	40
第三章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过程——主导产业的选择与升级	45
第一节 西部民族地区主导产业选择标准——一般性与特殊性	46
第二节 西部民族地区主导产业选择过程——产业改造与技术升级	50
第三节 西部民族地区主导产业的更大发展——增长极的选择与培育	51
第四节 西部民族地区主导产业的集聚和集中——专业化与集群化	53
第四章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转型与发展实践——企业及其竞争力的提升	55
第一节 西部民族地区企业发展及其竞争力提升的内生动力	56
第二节 西部民族地区企业发展及其竞争力提升的体制机制	58